

阳明心学集团引领晚明旅游文风变革因素探析

冯至纲

广州理工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40

DOI:10.61369/HASS.2025090017

摘 要 : 研究晚明小品文,可以发现文人除了政治、经济等层面因素外,作品中的浅显、直白风格,应该源自受到阳明心学引领出的游学及浅白语录体随笔所影响。本文从“明代后期讲学滥觞与转折”;“政策打压讲学更加速心学传播”;以及“心学形塑出语录体散文创作风格”等三个角度为切入点,援引“文学社会学”《同构理论》为解析工具,探究此一时期文学嬗变的综合因素。

关 键 词 : 王守仁; 明代后期; 旅游文学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Behind the Yangming School of Mind's Leading Role in Transforming the Late-Ming Travel-Writing Style

FENG Chih-k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Guangzho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40

Abstract : A study of late-Ming mini-essays shows that, beyo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auses, their plain and direct style was shaped by the traveling lectures and colloquial "recorded-sayings" vignettes promoted by the Yangming School of Mind. 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ree angles— "the rise and turn of late-Ming lecture societies," "state repression as an unintended accelerator of mind-learning diffusion," and "the school's moulding of a plain, dialogic prose style." Using the "Isomorphism Theory" from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as an analytical tool, To investigate the multifaceted factors behind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rough the lens of isomorphism theory.

Keywords : Wang Shouren; late Ming dynasty; travel literature

引言

明代后期大量文人走入山水,不论官场调动行旅,或是赋闲咏志、托物寄情,透过诗词吟咏、游记撰写,学术界多归结于政治因素与经济层面导致的社会生活模式改变,是论虽符合历史发展现实,但缺少对于文人集团内涵性因素的剖析。细究其中,明代中期阳明心学以及其后门人延续宋代以降的书院讲学风气,流动式的讲学风潮应该是创造晚明旅游文学高峰的重大关键。

“阳明心学”是集中国传统哲学、儒学、传统文学研究的一大领域,历年成果枝繁叶茂,在影响明代政治层面包含从王阳明思想形成、产生学派,到阳明后学对晚明内阁政治的影响;或是社会文化层剖析阳明后学对晚明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以及影响东林派思想的价值重构影响;也有从经济生活研究阳明心学的传播影响;当然更大部份是针对儒学思想以及文学发展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论题的形成有一定帮助,但较少关注心学文人集团与社会活动的风潮,并探查其中文化面如何导致旅游文学大放异彩的内涵因素,给予本文探讨的空间。

一个时代思潮,是经由长时期且大量的参与者,甚至历经数代人才会改变,而主导明代后期学术发展和形成文人集团游学风气,笔者认为王阳明承继了陆九渊心学,突破宋代程朱理学,是造成整个时代文风改变的最大推手。王阳明身故后,门人弟子再分成七个系统(黄宗羲,1987)^{①[1]},庞大文人集团令讲学风潮遍行天下,学者们行旅山水之间不乏创作写景抒怀的作品,因此丰富了行旅书写的篇章。

阳明心学跳脱传统程朱理学,融入佛、道思想,转由内心探究真理,对明代后期社会价值观念、社会风尚引发极大的变化。有鉴于此,本文引述相关文人行举及文献,援用“文学社会学”《同构理论》(戈德曼,1989)^{②[2]}为解析工具,探查阳明心学集团与晚明思潮之间的同构关系。以下分“明代后期讲学滥觞与转折”;“政策打压讲学更加速心学传播”;以及“心学形塑出语录体散文创作风格”等三个部份进行分析。

一、明代后期讲学滥觞与转折

明初太祖朱元璋将思想限定在程朱理学；至成祖朱棣纂修《性礼大全》《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作为士子学习和科举考试的标准，把知识阶层的思想限定在有利于政治统一的框架中。这个情况随着政治腐朽，结合社会经济的繁荣，令士人价值观发生变化。进入中期的武宗朝，王阳明自“龙场悟道”后便在贵州讲学，后宦途于江、浙、两广各地，主张“致良知”要能透过生活实践，讲学活动也不单纯于形式上的课堂教授，因为心学本从论辨析理而来，况且后继者不乏论道高手，易于形成风行天下的讲学浪潮。到了世宗嘉靖以及隆庆、万历朝，东南地区书院风气大盛，陆世仪观察隆庆与万历朝时期的士人“终日聚谈良知”几成常态（陆世仪，1996）^{③[3]}。心学门人营造的讲学之风，可谓盛况空前。

明代后期思想因心学动摇传统理学的话语霸权，成为日益强势的集团力量，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学术根源，尤其心学重视个体人格，尊重人的自然性，可以从崛起于民间的“泰州学派”的影响力略见一斑。如《明史·儒林传》评论泰州学派设坛讲道多位大儒，有拒绝当官的王艮、王襞父子，有放弃科考的颜钧、何心隐，甚至是李贽、罗汝芳弃官从学（张廷玉，1980）^{④[4]}。这些布衣硕儒游学四处大量招收平民学生，加速心学普级化并扩大影响层面，也产生读书不为求官的思潮，亦有助于行旅游记的发展。

社会现况结合明代后期每况愈下的庙堂政争恶化，有学识的读书人对官场及市井生活皆不在意，赶考求功名只是人生历练，明显的例子就是公安袁宏道高中进士即便授与当时江南富裕的吴县县令，依旧辞官只求畅心游山玩水；也有靠着家中薄有田产，象征性的参与科考后长期旅寓他乡，留下丰富瑰丽的篇章，这以徐宏祖《徐霞客游记》最为耀眼。上述二例显现当时一种生活态度，读书人在心学引领之下走入山岳、浪迹江湖，在文学层面更因率意而为，为旅游文学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二、政策打压讲学更加速心学传播

考察明代后期历史发现，张居正死后，帝国内部随即出现混乱：万历十四年“国本之争”，来年“丁亥京察之争”，万历二十一年“三王并封”和“癸巳京察之争”，标志着党争日趋激烈。对于张居正改革的历史功过，史家评述互有褒贬。令人启疑的是为何其人生前隆享帝师之尊，为什么“身死未几而辱随之”？问题原因之一是认为与张居正禁讲学、毁书院有关（沈德符，1997）^{⑤[5]}，心生不满的心学集团籍由朝堂政争在其死后进行反击。

细究相关史料发现，世宗嘉靖皇帝曾对书院讲学风气形成政争有所不满，但力禁不止，延伸到神宗万历初期张居正当政，因为发生常州知府藉兴建书院之名行敛财之弊，对此张居正请吏部整顿官学，期后更拟旨诏毁天下书院，两次整顿文教矛头都直指讲学之风。阳明心学由于向科举制度的渗透和官方学者的推崇，到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强大的集团文人透过科举进入官场，为了替新政扫除意识形态障碍，张居正试图恢复独尊程朱的格局，确保政令与价值观同步下沉。

禁毁书院效果如何？依记载，万历七年诏书下达后，“毁应

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夏燮，2013）^{⑥[6]}，在当时约计大明帝国高达一千六百余座书院的盛况来看，禁毁书院范围并不普遍，其实张居正反对的是为官者因讲学而废公务，例如万历五年二月“泰州学派”罗汝芳转左参政，入京进完贺表却出城到广惠寺大会同好讲学，张居正气极之余勒令其致仕。当不当官对泰州学者而言，显然比不上讲学重要，《明儒学案》记载，遭到罢官的罗汝芳竟然带着弟子们离开北京南下到南京，再从浙江进入福建、广东，“所至弟子满座”（黄宗羲，1987）^{⑦[7]}。因为张居正只严禁官员讲学，罗汝芳被罢官更带有遭受“政治迫害”色彩，布衣形象更受市井欢迎。

张居正改革是采取威权手段，包括压制言路、禁毁私设书院、反对官员聚徒讲学等措施，引起文人集团不满和抵抗，终致死后立即出现回击，思想裂变日益加剧。史家也将明代言路之坏令党争白热化归咎于张居正。^{⑧[8]}情况恶化出现两种趋势：其一是政治权力失衡后的反弹，官僚派阀势力纷争不休；其二是政治层面欲意禁锢思想，但讲学、清议活动却更加热烈，如东林党在张死后大力倡导书院讲学并藉以迅速壮大。

神宗万历到思宗崇祯亡国的时期，因为阳明心学已不可遏止，原本仕途颇有地位和影响的文人，一旦官场上遭受排挤或打击，便转而与同样际遇者以及隐士、布衣订盟结社，诗酒酬唱，且多奉佛习禅，这段时期文人心态，思想兴趣好老庄，与僧道打成一片，逍遥自适；文学观点集中关注人生，并注重反观内心的体验和感受，写游宴之乐和闲适之趣，生活情致与泰州学派狂禅思潮结合的更加紧密，藉此寻找精神寄托和人生乐趣，不仅诗社得以兴盛，禅风也迅速蔓延，走山访水畅意生活领悟，留下行旅佳作。

三、心学形塑出语录体散文创作风格

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于讲学论道，《传习录》中的语录体文字，就是他讲学的记录，王阳明曾对其编写提出意见，并审阅原稿后授予弟子，此种口述笔录的风格，直接影响王门后学也兴起论述著作的风潮，黄宗羲《明儒学案》整理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这6个王门分支、36位名传后世的心学大家，计有45部语录体文献，再加上阳明心学最大集团“泰州学派”16人18部文献，皆是效法《传习录》模式，或自己编订，或由门人弟子记述，将其讲学论述以语录体留传后世，口语化的文学体裁著作，形成对明代后期散文记述模式的直接影响。

王阳明在讲授“致良知”便反对过度文字修饰，因为会产生义理偏颇的弊病，所以主张“达意而止”（王阳明，1936）^{⑨[9]}，行文追求脱落自然、简明浅近，撰诗写文如同讲学论道般，文字风格力求简明切实。王阳明及王门后学采用语录体散文，在随事问答的行文和言简意赅、生动活泼的表述中，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学说，冲击到传统叙事和论说文体追求委曲详备、广证博论等整饬刻板的体制形式规范，笔法直抒胸臆、不加藻饰，正是形塑明代后期游记类诗、文趋向浅白的特点。

王阳明摒弃繁饰而趋向朴质的书写取向，连世宗嘉靖到神宗万历中期政治文坛领袖、素主复古的王世贞也称其“快爽如哀梨入口”（王世贞，1922）^{⑩[10]}。王阳明以通俗浅显的话语和自然流畅的行文结构，将复杂不易辨析透彻的事理予以简化，在学术思

想上拉近了抽象事理与一般受众的距离,以清新自然、明白通达的散文语体风格。为明代后期流行放任狂诞当风流潇洒的文人,找到了可随心所欲、信手随口地自由创作的依据,是开创明代后期游记风格的重要脉络。

王阳明后,文学史中罗列出众多文学主张,如唐顺之首倡“本色论”,徐渭表现“真我”,到李贽抒写“童心”,焦竑寻求“性灵”,袁宏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及钟惺、谭元春的“深幽孤峭”,名称与细节虽有不同,但在强调散文应表现作者现实人生感受和内心丰富情感的层面,与心学精神内涵相符,这也是明代后期旅游文学追求真实境遇,表达内心真知目标之所在。

阳明心学是讲道德世界的做人之心,在王门后学实践中转移为文学世界创作之心,强调主体性灵在心与物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主张通过主体之心灵观照和体悟,从客观事物中获得性灵释放和审美感受。王阳明与后继文人集团的良性性灵观念,形成中国文学思想由早期以物感悟,落实到以心为主的“性灵说”,开启文学创作主张轻灵隽永、明白畅达的语体风格,成就明代后期旅游作品不论是外在的格式、体裁,或是内涵的意境、情感的铺陈,都产生出新的时代变化。

四、结语

全文梳理明代中期之后由于心学讲学风潮的形成、政策打压反而加速心学传播、以及心学文人集团采取“语录体”传世著作等三个角度,解析明代后期旅游文学作品风格变化的内涵因素,也符合文学社会学中《同构理论》观点,论证社会集体对于时代发展的直接影响。

本文内容聚焦在阳明心学集团,刻意避开与王阳明同一时期且在两广、湖南等地影响力更大的“甘泉学派”宗主湛若水(1466-1560)等人,实际是这二支心学文人集团皆以游学各地的形态传播心学,过程、手段及效果极为类似,仅举一隅论之。至于个中细节及区域发展差异,也可另辟专文探讨。

注释:

①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明儒学案》在“姚江学案”论及阳明心学的流变,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以及泰州学派等7个分支。

②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同构理论》,认为作品不是单纯属于作家意识的产物,是社会集团或阶级意识的集体性反映,由此观察可以得知文化创造的主体是“社会群体”并具有“集体特征”。〔法〕戈德曼(著),段毅、牛宏宝(译),《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页182。

③陆世仪描述:“正德、嘉靖时,湛甘泉、王阳明诸先生出,而书院生徒乃徧天下,讲学于斯为烂漫矣。而阳明良知之学为尤盛,龙溪(王畿)、心斋(王艮)诸公继之。……隆庆、万历此时,天下几无日不讲学,无人不讲学”。清·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6),页20-21。

④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儒林传》(台北:鼎文书局,1980),页7275。

⑤沈德符认为:“江陵公(张居正)痛恨讲学,立意翦抑。适常州知府施观民,以造书院科敛见纠。遂徧行天下拆毁。……江陵败而建白者力攻,亦以此为权相大罪之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书院》(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12。

⑥清·夏燮,《明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519。

⑦罗汝芳遭罢官后“归与门下走安成,下剑江,趋两浙、金陵,往来闽、广,益张皇此学,所至弟子满座。”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三》,页760。

⑧赵翼论张居正之后,“继以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先后入相,务反居正所为,以和厚接物,于是言路之势又张。张文典、丁此吕等即抗章劾阁臣,而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12。

⑨《与汪节夫书》:“凡作文惟务道,其心中之实,达意而止,不必过求雕刻,所谓修辞立诚者也。”明·王守仁(著),吕何均(重编),《王阳明全集·王阳明书牍》(上海:大东书局,1936),页94。

⑩王世贞《艺苑卮言》赞扬王阳明文章“如食哀家梨,啍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飞瀑布岩,一泻千尺,无渊亭沈湫之致”。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页3428。

参考文献

- [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明儒学案[M].台北:里仁书局,1987.
[2]〔法〕戈德曼(著),段毅,牛宏宝(译).文学社会学方法论[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3]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6.
[4]张廷玉,等.明史[M].台北:鼎文书局,1980.
[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王守仁(著),吕何均(重编).王阳明全集[M].上海:大东书局,1936.
[9]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